

## “摄”取珍贵抗战记忆<sup>①</sup>

### 讲述者

蔡尚雄（1919—2014），生于香山县张家边乡。1938年奔赴延安，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。1942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。1943年参与创建《晋察冀画报》，任摄影记者、晋察冀野战军第四、第二纵队摄影股股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



蔡尚雄

《人民画报》记者组组长、编辑部主任、副总编辑，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委、理事，中国文联委员。1960年摄影作品《分秒必争》获得东柏林国际摄影大赛银牌奖。1962年《黄河截流》获匈牙利国际摄影大赛金牌奖。代表作有《活捉伪县长》《解放娘子军》《分秒必争》《黄河截流》等。

### 决心奔赴延安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我在家乡经常看到日机从伶仃洋起飞。每次都有几十架日机掠过，飞往广州疯狂轰炸。有一次我在广州办事，住在海珠桥附近。日机来轰炸，此时防空部队高射炮、高射机枪猛烈还击，敌机仓皇投弹，落在离我住地房屋两三百米的地方，房屋玻璃都震碎了。听说有一次炸弹落在爱群酒店长堤马路一带，死伤市民数百人。在中华民族蒙

<sup>①</sup> 摘自蔡尚雄：《我的经历和摄影征程》，原载《蔡尚雄摄影作品集》，2005年。本文标题和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，略有修改。

受日寇侵略的危难关头，爱国青年涌上街头，掀起宣传抗日救亡运动。雄壮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彻广州市的大街小巷。我当时就是受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激励。以及在广州夏衍主编的《救亡日报》工作的四哥的影响和帮助下，决心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。

1938年6月，我和广州市的10多名青年学生一起，投奔北上之路。到达汉口之后，正遇徐州战事紧张，陇海铁路不通车，武汉也常有日机空袭，时局紧张，不能久留，于是我们被迫返回广州。8月初，获悉陇海路通车，我与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联系，又联系了10余个青年学生一起出发。这时广州到清远的银盏坳铁桥已被日机炸断不通车，我们便乘小轮船到清远站搭上火车。火车在北上的路上遇到两三次日机空袭警报。旅客随即下车到三四百米远的地方疏散防空。到达西安火车站时，宪兵检查很严，我携带的一本统一战线小册子，也被没收了。进入西安城后，我们就去联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。他们指点我们去延安的路线，并告诉我们在延安不能久留。我们雇了一辆胶皮轮马车拉行李，从西安出发，到咸阳公路时遇到国民党军卡哨检查，盘问我们到哪里去。我们说去甘肃兰州，才给放行。

8月上旬，我们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。从南方初到北方，要克服两个难关：一是“陕公”学习听课没有讲义，完全是老师讲课，学生做笔记。我有时听不懂北方话，笔记不能全记下来。为了认真了解讲义，下课后我就和同学核对笔记。二是生活关。陕北的主食是小米饭、土豆和萝卜。我们刚去到对饮食很不习惯。我们所住的村子很缺水，每天要下到100多米深沟去打水。下雨路滑下不去沟里，用水就相当困难。我们不能像南方一样每天洗澡，于是不到一个月我全身生满疥疮，坐卧不安，晚上经常睡不好觉，早上还要出操跑步。虽然生活不习惯、很艰苦，但我以乐观精神，坚持锻炼。同年12月上旬，我们这届学习圆满结束。

### 东渡黄河到敌后根据地去

毕业上前线去。我们“陕公”两个队200多人动身去敌后晋东南冀鲁豫边区根据地。走到延安时传来消息，前方情况有变，我们随即转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1939年初在延安东门外举行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参加了这次开学典礼。我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。在此期间

我成为中共党员。

1939年春，我们在蟠龙住地，响应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号召——开展大生产运动、自力更生丰衣足食，每天清早走10多里山路去开荒。为克服经济和粮食困难，每人要完成3—5亩地的开荒任务。经过一个多月，我们连队全部完成开荒生产任务。

1939年夏，日寇增兵华北，妄图渡过黄河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——陕北。战火逼近延安，国民党顽固派也增兵关中，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。在严峻的形势下，党中央提出：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、鲁艺、青训班、工人学校四校联合，成立“华北联合大学”。抗大由副校长罗瑞卿<sup>①</sup>率领5000名学员，华大由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率领约3000名学员，分一、二、三梯队，一起开赴敌人后方，坚持华北抗战，去敌后开展国防教育。

长途行军，要通过阎锡山统治区和敌伪统治区，临时无法筹粮，每人必须背着7斤干粮。我们是从葭县到黑峪口、府谷一带渡黄河。这一带有我120师驻军，群众基础很好。由此渡河东面是山西省的兴县。这里渡口水流很急，但较平稳。渡船是“方舟”，方形而略长，每船可容四五十人，由当地的老艄工掌舵，头包白毛巾的船工都是青壮年小伙子，负责撑蒿、摇撻。我们坐在船上似箭离弦斜飞于浊浪之中，一瞬间就到达对岸东南黑峪口渡口。为了迷惑敌人，我们行军多是走山间小道；为了封锁消息，我们经常夜行军，防止阎锡山顽固军袭击。每日傍晚起程，整夜行军，白天在村庄或树林山坡隐蔽休息，睡觉也不脱衣服。行军途中吃饭，由各班轮流自己做，吃的菜都是行军途中采摘下来的野菜。

这次东渡行军，最关键要通过同浦铁路封锁线。同浦路两侧的平川和小丘陵是日、伪军控制区，形成“封锁面”。在这个“封锁面”上，敌人据点、岗楼林立，许多重要的通道上又构成一层层交叉火力封锁线。我们通过铁路车站祈县以南、高村和平社车站之间这一带地区，离太原以北约70华里，太原敌人机动部队随时可能出击。我记忆中最艰苦的一个晚上走了100多里路，必须在午夜过完铁路，拖到拂晓就容易被敌人袭击。过封

<sup>①</sup> 罗瑞卿（1906—1978），时任抗大副校长、教育长，主持抗大工作。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。

锁线这天晚上，月色分外明亮，长空澄清，清光似水，照耀平川大地。虽然很紧张，但走路还很顺畅。前头不时传来口令：“快快跟上，不要掉队！”前头快走一步，后面就得跑步跟上。过封锁线瞬间，我特别观察了周围动静，看到两边铁路都是持枪守卫的八路军卫士，紧张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下来，跟着部队快速冲过。快到山跟前，略歇一下，继续前进，翻过一道山顶。我班还有个病号，两个同志挽着他爬上山，我则帮他背背包，大家上气不接下气，爬得浑身大汗。翻过山顶，下到山腰一个山坳里，树丛中有一个小村庄，路边有个坑积水，大约50米宽的水池。大家都渴得喉咙冒了烟，也不看那水是如何脏，跑下去你一杯我一杯痛饮一阵。一歇下来，疲惫得躺在地上睡着了。歇10分钟，继续前进。在连绵的高山上，曲曲弯弯向东走了几十里，才突破敌人封锁线，到达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

队伍沿着奔流的滹沱河走，一路上看到两岸果树茂密。阔叶的柿子树结满橙黄色的肥大柿子，枣树上满是累累的青红枣，花椒树上红珍珠般的花飘着香——物产真丰富啊！村庄一律是平顶白色房子，显得整齐清洁。村口有儿童站岗放哨，群众觉悟很高，谈起话来也懂抗日道理，不愧是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！我们抗大的队伍一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每个人都精神抖擞、歌声嘹亮：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……万山丛中，抗日英雄真不少；青纱帐里，游击健儿逞英豪……看吧，千山万壑，铜墙铁壁，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……”

经平山县进入灵寿县境内，见到两旁路边白杨树下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同志陪同贺龙师长在迎接我们路过此地。大家看到贺师长很高兴，很仰慕这位敌后抗战的常胜将军。当时正是灵寿县反“扫荡”陈庄战斗刚结束，部队由他指挥获得歼灭日军500余人的胜利。更高兴的是贺师长还给我们讲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。大家很受教育和鼓舞，加强了在敌后工作的勇气和信心。贺师长还向罗校长要了几位会打篮球的学员去120师师部工作。我记得我们连队一位姓龙的同学，很会打篮球，被贺师长选走了。

### 晋察冀战地摄影岁月

我随抗大总校东渡太行山，到达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毕业分配到

边区完县文教会，在文教组从事宣教工作。每周出版一期“县报”，我负责编辑工作和刻蜡版，还不定期出版刊物《完县文化》。后来调派我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美术系学习。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（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前身）从事舞美工作。

1942年夏，军区创办《晋察冀画报》。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山沟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出版16开本画报，是非常困难和艰巨的。但它以真实、生动的照片，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、英勇抗战的事迹，反映抗日战争和生活的艰苦历程，起到团结人民、鼓舞人民、教育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作用。它用真实的形象反驳来自各方敌人的污蔑，使全国人民了解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。它用事实反驳那些顽固派散布“八路军在敌后游而不击”的言论，使之不攻自破。画报的出版启发了我，促使我决心当一名摄影战士，到部队去，到前线去，进行抗日斗争的宣传报道。

1943年春，我如愿参加晋察冀画报社工作。沙飞同志发给我一台拍16张蔡司依康泰陈旧目测距离的照相机，听说是缴获来的。在物资条件极困难时，这对我来说是十分珍贵的。从此我以照相机为武器，从事新闻摄影工作，拍摄抗日斗争史实。搞新闻摄影工作必须到现场采访拍摄真实生动的事迹，所以我经常随八路军、游击队，深入游击区和敌人后方活动，同战士一起行军作战，爬山涉水走遍了敌后根据地，亲眼看到日寇的残暴行为。1943年反“扫荡”中，我在阜平县采访拍摄沙河两岸游击队声东击西打击敌人的场景时，听到消息说敌人在阜平下平阳村杀了许多老百姓。我冒着生命危险，赶到村里采访，决心用真实的照片揭露敌人的暴行。当我走到下平阳时，还看不到老百姓回来的影子，只看到残垣断壁，满地是被宰杀的牲畜和鸡毛，被烧毁的房屋还在冒烟，树旁躺着一具被杀害农民的尸体，惨不忍睹，还有被敌人杀死的老百姓都埋在井里。

作为一名摄影战士，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，我不怕行军打仗，不怕艰苦，深入连队，深入敌人后方。听到哪里部队最活跃，就到哪里去采访，力争多拍摄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抗日真实场面。

1944年春，我随第二军分区部队在五台山金山寺、金阁寺、镇海寺一带活动，爬了不少大山。经过军民几个月围困和征战，解放了被敌人占据的1200平方公里的“无人区”，我也拍摄了日寇号称华北最坚固的12个



蔡尚雄 1944 年春所摄。展现了八路军一举攻克五台山区东峪口、王成、柴峪等据点，部队进驻东峪口据点时的情况。

碉堡，以及日寇“三光”政策中遭受“烧、杀、抢”之后的五台山区农村的惨景。夏天我又随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美、政委张连奎带领的游击队到同浦铁路定襄、忻县平川一带敌占区和游击区活动。有一天，攻打定襄县城的战斗在夜间打响。战斗中不能打镁光粉拍照，但我抓紧时机，等部队撤出战斗，游击队押着活捉的伪县长和伪军俘虏胜利而归的时候，借助拂晓的晨光，拍到了这令人扬眉吐气的瞬间。

1945 年春节前后，我到榆寿游击支队采访。那里是太原郊区和正太铁路沿线，有煤矿，是敌人重点把持的地区。日寇据点林立，汉奸特务也猖狂。武工队、游击队分散活动，一方面对敌据点开展政治攻势，指出日寇是秋后蚂蚱，没有多大蹦头了，对那些死心踏地当汉奸的坏人，坚决打击镇压。另一方面，每到夜幕降临时，就是游击队的天下。游击队每晚都要行动，在二、三十里的范围内，神出鬼没、声东击西、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。我在这里活动两个多月，深深体会到游击队的威力。在活动中有两次

遇险：一次是在太原郊区，侦察员夜间带我到敌据点附近的村子里找一位商人，托他去太原购买摄影器材。我们夜里住在老乡家中。第二天拂晓老乡上房扫雪，发现敌人突然袭击包围了这个村子。幸亏陪同我去的侦察员机智勇敢，对当地村子的环境很熟悉，果断领我从一条冰冻水沟拼命地跑出重围，化险为夷。另一次则是阳泉伏击战刚开战时，我方机枪突然卡壳，敌人凭借优势武器疯狂反扑，幸好李政委指挥一个班用手榴弹压住敌人，掩护我迅速撤出阵地。作为战地记者，到前线拍摄采访照片时，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。我是战火中的幸存者。

1945年8月15日，这天晚上我们部队住在孟平县滹沱河北岸康庄的村庄里。深夜传来了“日本投降了”的特大喜讯。这像春雷的声音迅速向全村军民传播开了。家家户户都起床爬上房顶敲锣打鼓。有人甚至高兴得敲脸盆来庆祝抗日胜利……

#### 【延伸阅读】

## 奔赴延安

### ——记抗战期间北上抗日的中山籍青年

抗战爆发后，在中山军民同仇敌忾，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之际，有一批中山籍青年带着共同的理想信念，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他们当中，有的受党组织委派而去；有的受进步思想和抗日洪流鼓舞自行前去；有的最终到达了目的地，有的则由于战局变化等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到达延安，而是在半途加入新四军、八路军等革命部队，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各分校就读，或以其他的方式参与抗战。他们殊途同归，以中山有志青年的名义，在我国抗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#### 驰骋沙场 英勇杀敌

赴延安的中山青年中，以最直接的方式实现抗日宏志的，无疑是踏上战场、扛枪杀敌的那部分。这个群体并不大，而刘舒、方少穆、何镇浪、

谭则敏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。

东区齐东村青年刘舒，1917年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，1933年秋考入中山县立中学，开始接触进步思想，1936年考入广州知用中学就读高中。在革命中心广州，他结识一批进步青年，经常参加“读书会”，研读进步读物，并目睹日舰水兵的横行霸道，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得到进一步激发。1937年9月，他与就读广雅中学的中山青年黄峰等9人共赴陕北“学打游击”。是年冬天，他们抵达延安，“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”。随后，刘舒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学习。该校校长是成仿吾、副校长李维汉。刘舒与聂荣臻的弟弟同班，学习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、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，曾经聆听过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陈云、何凯丰、任弼时、李富春等领导同志的授课。1938年3月毕业后，作为从600名学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30名学员之一，他被送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续深造，编入第三期第三大队（知识青年大队）。同年5月底，“抗大”第三期学员毕业后遂奔赴山东敌后战场。他们离开延安、东渡黄河、入山西、经河北，长途跋涉一千多公里，最终到达山东沂蒙山区。此后，刘舒历经大大小小的截击、伏击、爆破等战斗，在1939年一次保卫沂蒙山区人民的反“扫荡”战斗中不幸牺牲，英年早逝。他是为数不多的北上抗日而牺牲的华侨子弟。

沙溪濠涌籍青年方少穆出生于1915年，1932年考入省立第一中学（即广雅中学），在广雅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，参加了学校的“救亡歌咏团”等活动，还聆听过叶剑英到该校发表的抗战救国演讲。1938年夏，他毅然离开学校奔赴延安，在历经土匪洗劫、反动派阻挠和饥寒交迫的考验后，终于到达延安，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学习，并在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4月下旬，从“抗大”提前毕业后，被派往四望山参加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。四望山地处信阳、应山、罗山三县交界处，是抗战初期新四军第五师前身挺进支队的驻地，也是豫鄂边区的交通咽喉。在豫鄂边区，方少穆随部队多次与敌、顽作战。其中1940年春、夏，该部两次痛击日军，毙敌8人，生俘19人，缴获枪支20多条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方少穆参加了淮海战役以及淞沪战役解放大上海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某部军级副政委，后来离休居上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漫长的革命人生

中，他先后4次亲耳聆听过毛主席的革命教导。

小榄的何镇浪是另一位北上后既进入“抗大”学习，毕业后又奔赴战场的中山青年。不过他最终抵达的是山西太行山区，而非延安，进入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，时间是1938年底。抵达“抗大”分校前，他与另外两名中山籍青年历经香港、湛江、广西、贵州、重庆、四川、西安、河南等省市曲折冒险，过潼关、渡黄河、经垣曲、登太行，走过了堪比长征的艰苦征程。1939年9月，何镇浪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中，从此与军旅结缘。他曾参加1941年著名的太行山黄烟洞保卫战。此役与敌军血战八昼夜，成功保护了一个较大的兵工厂。战斗中他与另一名战友李庄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）被敌人追击，从悬崖上跳下，正好落在一大堆干草上才幸免于难。抗战胜利后，何镇浪继续南征北战，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打了金城反击战，1959年入藏平乱。戎马一生中，他四次负伤，屡立战功。后担任信阳陆军学校政委，离休后在广州定居。

谭则敏，中山三区人，1935年秋在中山大学就读，1937年9月在广州参与了一段时期抗战工作后回小榄，任教于下基小学，1937年10月参与组织成立“中山三区青年抗日救国会”（简称“青抗会”）。“青抗会”成员50多名，大多为三区的知识青年，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活动。1938年10月后，在抗日形势的发展与革命思潮影响下，“青抗会”部分成员毅然北上，寻找更为广阔的抗日战场，其中有谭则敏、古寿珠、郭旷良、李琼儿等。由于战局变化，他们没能如愿到达延安，起先在陶铸领导下的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参加战地服务，稍迟一些谭则敏到西安参加了八路军，奔赴抗日战场。解放战争胜利时，谭则敏参与了北平、南京、重庆等重要城市的接管。

### 学成返乡 敌后抗日

如果说奔赴祖国各地战场的中山青年的轨迹是辐射，另一批的轨迹则是聚焦。他们中有从外地赴延安的黄峰，也有由中山地方党组织选派到延安学习的邝健玲、邝叔明、徐瑞、林启琛、林奕保等。这批青年从延安学到了抗日的本领，返乡后将所学所得开枝散叶，发扬光大，传播开去，对

珠三角敌后抗战产生了特殊作用。

黄峰于1937年9月与刘舒等一同去延安。当时其在广雅中学就读，受形势与进步思想影响，与同级的几名同学萌生奔赴延安的想法。刘舒得知后，专程找他要求同行。如上所述，他们最终从广州出发，几经波折到达延安，成为第一批到达延安的中山人。与刘舒不同的是，从“抗大”学成后，黄峰返回中山参加革命。回到家乡不久，他就在县委指示下，以一区抗先队的名义，于1939年初组织举办了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，任该班指导员，负责为学员们讲授“抗大”和“陕公”（陕北公学）的一套教学内容。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为其重点。这个训练班有学员六、七十人，绝大多数结业后成为抗战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。

邝健玲、邝叔明、徐瑞、林启琛、林奕保等5人则是由中山八区党组织分批选派，时间在1938年1月至5月，同年6至7月先后学成归来，成为中山对敌斗争的重要骨干力量，为开展党的地下秘密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中，邝叔明是1月到达延安。中山八区第一个女党员邝健玲则于春天抵达。八区区委委托这批青年党员，先后于1938年11月在小濠涌健民小学和1939年9月在月坑村举办了两期党员学习班。邝叔明、邝健玲作为主要授课者，为党员学员们讲授了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和《反对自由主义》等文章以及党纪党纲、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游击战等课程，大大提高了党员骨干们的政治思想水平、党的纪律性和革命素质，为中山八区的武装斗争作了坚实的人才准备。

### 战场以外 处处战场

还有一大批青年，北上后没有直接成为战场上的作战人员，也没有返回中山投身珠三角敌后战场。他们在战场以外执行党和国家交给的非作战任务，却处处精心经营他们的“战场”，与全国人民一起构成了最坚固的民族抗战防线。这个群体人数众多，李凡夫、黄中坚、蔡尚雄等是他们当中的一员。

李凡夫，在抗战时期理论界和教育界中是个闪亮的名字。1906年出生于四区濠头乡一个华侨家庭，原名郑赐祥。1926年至1929年在国立中山大学附中读书，开始接触进步思想。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，开始研读马克

思、列宁主义书籍，思想逐步趋向共产主义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毅然弃学回国，在中山大学继续求学并参加抗日爱国宣传活动。1933年夏北上到上海加入上海社会科学家“联盟”，1934年加入共产党，担任上海社会联盟常委、党团书记。1937年初，中共文化支部（后改为临时党委）在上海成立，李凡夫任该支部临时党委书记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他转移到了延安，成为最早一批到达延安的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。他就任《解放周刊》编辑，并担任红军大学、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等校教授，被当时公认为名教授之一。在延安，他作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，主要讲授《社会科学概论》（包括《社会发展史》《政治经济学》），并担任“陕公”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，为培养抗战干部作出突出贡献。仅“陕公”，短短两年内便培养了600多名抗日干部。

长洲青年黄中坚，原名黄祖雄，其父为当时长洲小学校长黄冷观（黄显成）。黄中坚出生书香门第，曾向名家学习书法，写得一手好字。北上抗日前，黄中坚在香港任教于中华中学，期间接受爱国和进步思想熏陶，读过埃德加·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（即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）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。1938年底，他与上述的何镇浪共同北上，就读晋东南“抗大”一分校。由于表现突出，提前被调到民革通讯社任助理编辑，后又调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《华北新华日报》任编辑。《华北新华日报》于1938年由何云创办，是宣传和组织群众，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，建设太行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。1939年7月，在太行山南麓抗日根据地——壶关县树掌镇芳岱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2年5月，在一次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的残酷扫荡中，黄中坚与何云等40多位新闻工作者在转移时被日寇杀害。今天，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，有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，纪念碑的正面由杨尚昆题词：“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！”侧面由陆定一题词：“一九四二年五月，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。烈士们永垂不朽！”碑背面刻有烈士姓名，黄中坚名列其中。

张家边乡青年蔡尚雄1938年6月开始北上，1939年初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，期间成为中共党员，并在一次机缘巧合中获赠一部相机，逐步成长为一名战地记者。他参加晋察冀画报社工作，“从此以照相机为武器，从事新闻摄影工作，拍摄抗日斗争的史实”。为了拍摄真实

生动的事迹，“经常随八路军、游击队，探入游击区和敌人后方活动，同战士一起行军作战，爬山涉水走遍了敌后根据地”。在他的镜头里，有日寇号称华北最坚固的12个碉堡，以及遭受日寇“烧、杀、抢”三光政策后的五台山区农村惨景，也有革命战士浴血奋战、英勇牺牲的壮举，为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忆。

此外，小榄青年何耀椿1939年1月由党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安排，从香港赴延安。1940年12月抵达，安排至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作，担任制版部主任，曾制作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挂像。沙溪溪角乡女青年刘展平于1938年7月从省女师毕业后奔赴延安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学习，接受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，朱德曾为其题词：“把全中国的妇女发动起来！”1938年底至1939年春，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……

1938年10月，广州、武汉失守后，北上奔赴延安的道路变得更为艰难，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山热血儿女抗日的脚步。他们在中山、广州甚至全国各地，在正面战场、敌后战场、各条战线，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，甚至付出宝贵的生命，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。

（摘自《中山党史》杂志2014年第二期，林伟桦/文。）